

大白兔模仿米老鼠 美加净打败高露洁

“上海牌”展览致敬上海品质

上世纪50年代的广交会上,上海送给各地客户的是一副“上海风景”扑克牌,52张牌除了大小怪之外,都是上海风景。其中有几个已经消逝的地标,例如上海跳水池,就是如今的上交音乐厅;上海杂技场,就是现今的仙乐斯广场;还有已经不存在的跳伞塔……这是市群艺馆二楼展厅的“上海牌”展览中,让观众最有共鸣的展品之一。

围绕不同“上海”字体,展品铺陈出的不仅是上海品质、集体回忆,还有“上海风景”的时代演变。设计了“上海啤酒”商标的陈赓年如今一头白发,他说:“上海人、上海产品、上海建筑,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是上海风景、上海脸面……”



上海出品 品质保证

上海牌,是优质产品的代名词。即便不是上海出产的上海品牌,哪怕只是印上“上海”两个字的包和衣服等等,也是流行产品。“上海牌”展,由市群艺馆和上海风景工作室共同策划,在全国36个城市征集了50件上海产品,同时展出了15本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海出口产品样本,恰好印证了当下提出的“上海制造”“上海购物”“上海服务”和“上海文化”四大品牌的勃勃生机。

当年做产品设计的,都是厂里的“美工组”成员,不少都已过世。风景工作室代表姜庆共介绍,上世纪70年代第一代大白兔奶糖包装铁盒上的底色是大红的,一只大白兔从蘑菇旁跃出,是其最初的形象。赵佐良回忆道,这是他看着如今已故的江爱周设计出来的。赵佐良当年在日化二厂美工组,“日化二厂就是出品百雀羚的地方。”他表示,1964年日化二厂成立的美工组,就是要解决当时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国货“问题”：“一等质量、二等包装、三等价格”,以至于在进出口贸易上开不出价,甚至被外国人买走后换了包装就卖出更高的价格。当时,中国的牙膏品质全球第一,高露洁也是美加净的手下败将。外国牙膏商人经常表示:“中国牙膏质量高,价格最低,千万不能让中国牙膏卖到国际市场……”早在1965年,美加净牙膏就创汇1600万美元。与此同时,还遇到了包装“仿效”国外设计、涉嫌侵权等问题。例如,大白兔奶糖的“前身”就模仿了米老鼠。赵佐良坦承,他当年设计的留兰香牙膏在一定程度上也模仿了绿箭口香糖。因为美工组的“崛起”,改变了生产厂家的“重心”。以前,工厂是以产品为主,而美



工组是以“品牌”为主,“大家都有了品牌意识之后,才提升了价值。”

上海设计 体现匠心

姜庆共还透露了一批“上海牌”改品牌名的原因。“上海牌”手表、“上海牌”录音机、“上海牌”照相机风靡一时,但是在出口上遇到了瓶颈:“国际上没有以城市名字作为品牌的惯例,大家没有看到过纽约牌手表、柏林牌相机,对吧?”所以,后来“上海牌”手表改为“海鸥牌”,“上海牌”照相机也改为“海鸥牌”……到了上世纪70年代,上海各个厂家还“跨界”研制各类生活用品,“估计是因为大家都有学习技术的心态”。于是,1970年,国光口琴厂试制英雄牌黑白电视机;1971年金星金笔厂,试制金星牌彩色电视机;1973年,玩具元件厂试制葵花牌盒式磁带录音机……

最为难能可贵的是,当初根本没有电脑,所以,所有的商标设计、广告图案都是纯粹手绘。陈赓年从部队复员后分配到上海啤酒厂,后来转进美术组,设计上海啤酒的包装:“年轻人不知道我们是怎么过来的,所有设计根本没有辅助工具,更别谈电脑了,都是大家一笔一画,手工画出来的!”

因而,这一“上海牌”展览,不仅仅是留存、展现半个世纪以来的上海设计文化和审美风格,抑或转瞬即逝的时代,更是向那些曾经为上海设计奉献青春的前辈设计师致敬。大家最关心的“上海牌”手表的设计者是谁?据传,是手表厂的一位工程师。展品说明上写着:佚名。 本报记者 朱光

升国旗半秒误差也不容

主题音乐党课讲述国歌背后故事

“2011年,利比亚发生动乱,中国政府撤侨。当时,很多在利比亚的中国人因为仓促,没有带上护照,没有身份证明,埃及军方不让人入境,还有很多其他国家难民也想冲过去。中国驻埃及大使馆说,这很简单,会唱国歌的,就是中国人。”昨天,被誉为“中国指挥国歌次数最多”的指挥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原团长于海(见左图)来到上海师范大学,带来了别具匠心的主题音乐党课——我们的国歌。

“《战狼2》里,吴京举着国旗通过战区的情景并不是杜撰。”在今年初央视播出的《国家宝藏》第二季中,于海也到了节目现场,和张国立一起讲述了利比亚撤侨的故事,他也成为了《国家宝藏》第二季最赚足眼泪的今生故事讲述人。来到上海,他再次讲起这段国歌的故事,依

然充满了敬意。

2011年2月,利比亚动乱。中企工地遭到袭击,通讯基本中断。约3万中国人滞留利比亚……中国政府协调派出91架次民航包机、12架次军机,5艘货轮、1艘护卫舰,租用35架次外国包机、11艘次外籍邮轮和100余班次客车,海、陆、空联动,从利比亚撤侨,最终将35860名中国公民平安撤出利比亚。就像电影《战狼2》里,吴京举着国旗通过战区的情景,当时有些人是陆路撤离,从利比亚撤到突尼斯或埃及,有的同胞因为护照丢了,无法出境时,前来协助撤侨的人就让他唱一首国歌,唱完就放行。在央视讲完这个故事后,有人感慨道:“此生不悔入华夏!”

“国歌、国旗那时已经不是简单的一首歌和一面旗帜。当撤

侨进行的时候,当同胞们唱着国歌、举着国旗通过边境的时候,国旗和国歌就是我们的力量来源,是我们精神归宿。”于海说,“有人一下飞机,就跪下亲吻脚下祖国的土地时,每个人都泪流满面。激动啊!回到了中国,我们自己的土地上!才能真正体会到中国是我们的根,是我们的魂。”

自1970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,于海近50年的军旅生涯里,经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、50周年、60周年大阅兵和北京奥运会,以及党代会、人代会、政协会和欢迎外国元首检阅仪式等重大活动,数千次指挥军乐团奏响《义勇军进行曲》,他最难忘的还是1999年国庆大典前的一通电话。

“那天,电话那头跟我说,彩排中发现每次国歌奏完后,国旗

距离顶端还有三四厘米的距离,要消除这样的误差。”于海挂了电话,找到了国旗班,国旗班的战士说,“升旗的装置是由电脑控制的,和国歌的时长一样,46秒,这个绝对不会错。”于海自己知道,国歌的节奏已经溶在解放军军乐团每个乐手的血液中,46秒也绝对没有问题。“后来,我发现升旗手要听到国歌第一个音符后,才会按下按钮,这中间有半秒的误差,而国旗杆有30米高,国旗每秒要运行30多厘米,问题就在这半秒中。”后来,军乐团和升旗手定好,升旗手看着指挥的手势,在国歌奏响前指挥打个4拍,升旗手在最后一拍时按下,就严丝合缝了。

在历时近两个小时的音乐党课中,于海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》的发展历程,到国歌是国家神圣的象征、家国情怀的体现,再到最后以自己坚持十年推动国歌立法等背后故事,生动展现了“国歌”所经历的峥嵘岁月。台下党员和台上于海热烈互动的场面,也让这堂别开生面的党课掀起了一拨又一拨高潮。

本报记者 吴翔

